

海宁县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勾心斗角

从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，海宁基本上是属于顾达一、程森士、凌华这些人的势力范围。顾、程、凌在政治上虽然同属罗霞天这一派，但在相互之间，各派势力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勾心斗角的斗争。不论在顾程之间、程屠、程沈（屠琦、沈永香）之间，顾程与凌华之间，都互相猜疑，互相依赖，互相利用，在县党部内部是如此，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也是如此。特别是在三青团建立和党团合并以后，许多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尖锐。

错综复杂的关系

抗战后期和解放前夕，在海宁，程森士的社会基础，除了民政科、教育科的人及各乡镇长、小学教师以外，还有各小集镇和乡下的“土皇帝”（所谓“地方士绅”）。这些人中间，尤其是抗战后期“挑担县政府”、“挑担县党部”驻留过的地方为最多。这些人都是程森士的社会基础。他们有事托程，有时程应邀下乡。他们需要程，程更需要他们。上下相互勾结依存。有一次，我到程家，亲眼看见，著名的汉奸中队长沈虎清也成了他的“座上客”。

县党部工作人员很少，但在程森士眼里也有“游击干部”与“战后干部”之分（前者如魏味琅、张效正，后者如谢载青、陈述人）。程与我也是时亲时疏，时好时坏。如在接办私立励志中学及创办《海宁导报》时，程因我有个小同乡资本家周谓滨，为了筹集资金，就紧紧把我拉住。

程森士是顾达一提拔起来的。程一向把顾看作上司。但为什么程仍敢于任用被顾歧视的魏味艰，而程与顾不会闹翻呢？这里面也有文章。

魏曾在省党部宣传科工作过科长吴一飞是方青儒的派系，而顾是罗霞天的派系，方、罗对立，因此顾歧视魏。程的用魏，是打算今后一旦罗霞天调离浙江，通过魏可另找靠山，即向方青儒靠扰。顾自己在省里，要控制与过问海宁的政治，许多方面需要通过他，而他在海宁的力量也逐渐膨胀，所以，未便为此闹翻。

我是在浙西行署时认识顾达一的，抗战胜利后经顾介绍来海宁。程委我当县党部秘书，并非单纯地接受顾意，而是认为通过我，可以拉拢上层关系（当时省、县许多头面人物是前浙西行署的人）。以后在相处的过程中，程与我有时思想不统一，发生矛盾，也不能随便更动我。因为省党部的书记长（相当于主任秘书）林揖艺，是原浙西行署的秘书林林的近身职员也常与我通信。程在创办《海宁导报》和接办私立励志中学时，我也帮过他忙，这些也是程不能随便将我一脚踢开的原因。

有一次，程的妻子戴谷音在杭州住了多天，回来后说：“政治舞台原是残酷的”！在那时的派系斗争，也确实是如此。

三青团的建立和党团矛盾

海宁在沦陷期间没有三青团。1946年上半年，才在硖石干河街一所房屋门口，挂起“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省海宁县支部筹备处”的招牌。省方派来负责筹备的是一个临安人，名梅迎春，另外看不到人。他常走访县级党政机关。不久，梅调离海宁，又换了另一个人（姓名已忘），

任职时间很短。这些人都是在所谓筹备期间。大约在1946年冬至1947年初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）省方派来了吕燮文，林朝果等人，才正式开展工作。与此同时，牌子上也抹去“筹备处”三字。

吕燮文是负责人，林朝果是主要骨干，还有做抄写工作的，有张小钊及一个姓陈的（名字已忘），都是新昌县人。吕曾在中学里教语文，一到硖石就走访县级各机关首长，并在《海宁民报》上发表文章，作为“开场白”。林的经历不详，不写文章，也不走访，但在硖石本镇，发展三青团员主要是他。有一次，在硖石大戏院开什么纪念会，会毕，林对一个袜厂女工问长问短，并在日记本上写着。不久，非但在硖石发展了许多三青团员，在沈士前地区（长安以北）也发展了许多农村青年入团。林朝果常常跑到沈士去。硖石的团员，有的是商人，有的是失业青年；沈士的全都是农村青年。我有时夜晚从于河街走过，只看见团部里面，三青团员们排着队，吕燮文在对他们讲话。

吕、林等一开始就和县党部不通气，并且常常攻击县党部。县党部的职员们不是他们的攻击对象，所以职员们以和平相处的态度，常走进团部去同他们聊天。有一次，县党部职员傅大一，无意之中与他们说起，物价上涨，经济困难，县党部的经费没有增加等情况，林朝果插嘴说：“你们只叫程森士到森泰木行里去拿些钞票来，就解决了。”这话传到魏味艰耳朵里，魏惊呼：“小辫子给他们扭住了。”（抗战胜利后，程有个朋友在硖石市梢河边开设了一家“森泰木行”，程是股东之一）程森士听到后非常恼怒，因团方所攻击的是顾达一、程森士和凌华县长。凌华不卖他们的账，不睬也看

不起他们。

沈士乡长方祖英常常来硤，对程森士说：“林朝果一到，一声哨子，三青团员们都集合听林训话。沈士的三青团员常常反对乡公所。这样发展下去，怎么办？”有一次，方祖英又来县党部找程森士，对程说：“林朝果的做法，是共产党的做法。他到沈士来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请你布置人，把林弄掉算了！”程呆住片刻，回答说：“现在不是抗战时期，随便杀人。现在要讲法律。随便弄掉他，省里要派人来调查。程森士感到左右为难。

吕、林发展三青团员，只在硤石镇及沈士地区。其他地方，如长安、袁花、盐官、斜桥等处，他俩没有直接去搞。如袁坝人张帆，他的入门不是在袁坝，是在沈士地区。

选举国大代表前后，又有一次选举立法委员（听说中央的立法委员工资很高。国大代表当时是无工资的，只开会时川旅费多些），海宁当然选罗霞天。临近选举前，林朝果手拿皮包。后面跟随一个穿军装的，走遍全县各乡（镇）公所，布置选省里另一个人（姓名已忘）。事后，这个人的落选，毕竟海宁县是罗霞天的势力范围。

根据双方的力量对比，这是必然的。顾、程在本县工作多年，势力范围既深且广，团方只有吸收未久的部分青年；党方委员职员大都是本地人，团方吕、林等是外县人，人地生疏；党方除了党员党组织之外，还有社会关系——如商界，团方就没有。

由于以上种种因素，程森士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：吕林虽吵闹，不怕他们。

有一次，程在路上遇到我，余怒未息地对我说：“我从三青团团部出来。我对林大发脾气，我敲林的办公桌！”“究竟为了什么事，他没有具体对我说，后来，我也忘记问他。

党团合并 针锋相对

1947年下半年，传出消息，要实行党团合并，团方已在作合并的准备。因为县党部原来已有执行委员七人，团方却没有，必须赶紧并凑起所谓“干事”七人，双方人数相等，合并才不吃亏。三青团的七人，除吕燮文、林朝果之外，尚需五人。后来他们又找到长安的杭毅及反顾人物朱奇生，另一个是沈士汤留芬（汤原是小教）。当时在县政府任科员。另外还有两人，因只开过一次会，记不清了。吕、林事先曾请这几个人到团部开过一次会（类似成立会），会后又摄影留念。

1948年初夏党团正式进行合并。依照省方来文规定，召开合并会议。这次会议在县党部召开。县党部七个执行委员都到齐。团部方面，除杭毅缺席外，其余都到。

这次合并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有：1、依照中央规定，取消三青团这个名称，原有团员，均转为党员，双方造册上报；2、原县党部作为合并后的办公地点；3、原团部作为职员宿舍。还有其他次要事项，讨论题不多。会议时间很短，漫谈的时间较长。这次之后就没有再开会，算是党团合并了。党员、团员只在报上看到消息，没有召开党团员会议。

合并会议开了以后，程森士立即叫陆明清、马锡猷两人的床铺搬

到原团部去住，借此监视对方。

吕、林两人常来县党部看报，并不办什么公。张小钊和那姓陈的每天拿了团员名册到县党部里来抄。午饭及傍晚下班，都把名册随身带回去，不给党方的人看。由于这样，张效正也把党员名册藏好，出外时锁好，不给团方的人看。

党团虽已合并，吕、林仍接受省里他原来这一派的上级的指使。因为凌华及顾程是罗霞天的派系，他们想从凌华县长身上打开缺口。也是机会已到，报纸上公布，省政府已派出几个视察团，轮流分赴各县视察，并已定出日期。有一天，休假日，马锡椒发觉林朝果把长条便章（公章是锁好的，长条便章因为是收发文用的，正式行文不用它，所以平日不锁好）很快地盖在许多空白的红绿色标语纸上。当晚，马、陆两人走进宿舍，看到这些标语纸尚未写字，趁没人看见，很快地用毛笔把兰色的便章涂掉。待省府视察来的那天，吕、林等已在夜里把许多标语贴在于河街、县政府附近和县长的住房门口。标语上写的是“会计室主任不准住在县长公馆里”一类口号，每条标语都是攻击县长，左下角盖有“中国国民党海宁县党部”的长条章，上面虽已涂黑，但仍能清楚地看出所印的字。两天后，视察团离开海宁不到半个月，省府公布：“海宁县长凌华另候任用，派王启炜接任海宁县长”。这一次，林朝果胜利了。

党团矛盾从何而来？在海宁来讲，双方虽互不通气，但并无根本利害冲突，矛盾来自省方。他们攻击的顾、程、凌是罗霞天的一派；他们的省方靠山，听说是一个姓胡的，叫胡×维。吕、林等之所以过

样做，完全是奉上级之命，也是别有企图的。

所以，说穿了，所谓党团矛盾（也有的说得缓和一点，叫“党团摩擦”）实质上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。

（政协委员谢载青供稿）